

# 臺灣人文學科之種種挑戰

司徒尉\*



我於 1997 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攻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及文化歷史研究。我的研究興趣包含十九世紀大眾出版文化、書籍 / 閱讀史、情感文化及教育。在 2011 年，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發行了我的第一本專題著作——*Reading and Disorder in Antebellum America*。我的著作也曾刊

\*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登於一些學術期刊，例如 *Library Quarterly*、*American Literature* 及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同時我也得到來自許多機構的學術計畫補助，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美國傅爾布萊特外籍學術獎學金委員會 (J. William Fulbright) 及美國美侖基金會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s)；另外亦獲得 Huntington Library、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及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等學術研究圖書館的協助。從 2002 至 2004 年，我在賓州大學的 McNeil Center 擔任美侖博士後研究員，從事早期美國文學研究。到了 2009 年，中央研究院為歐美研究提供短期的研究獎金，使我能完成 *Reading and Disorder* 一書的最終修定。而在 2012 年時，我獲頒中央大學的教學傑出獎。

迄今，我的學術研究主要著重於美國內戰前的大眾文學，尤其是這些文學被建構、理解為「閱讀」之相關問題，包含其如何影響當時社會及物質生活的狀況。完成專書著作後，我便開始著手兩項新的學術申請計畫。第一項是研究探討十九及二十世紀時，煽情主義作為一公眾言說的主要模式，儘管它對公眾事務影響深遠，文學及文化評論家卻極少關注。第二項則是討論文學在臺灣英文系的教育體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在臺灣社會、文化及科技種種變遷下之定位問題。

常聽聞人說，人文研究茁壯的比自然科學緩慢，作為一個學者及評論者我深表同意。作為外國文學及文化研究的研究學者更是經歷如當地資源的限制，以及原文書籍資料庫取得不便之種種困難。在 1997 年畢業不久後我來到中央大學任教，當時校內幾乎沒有電子郵件服務，遑論高速的網路。當時圖書資源並不多、教學繁忙、行政服務亦令人卻步（臺灣的教職人員更需要承擔外國教師無法執行之業務）。對於年輕的教授來說，外國籍的教職員誠需顧問指導及責任制的系統，才得以逐步達成教學研究專業化的需求。

除了教學的職責依然沉重之外，其他情況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有著大幅改善。教育部及國科會的資助擴張了圖書館藏量，並購買線上資料庫使臺灣教職員得以獲得更多有利的資源與國外研究學者並進。數位及線上資源的成長更提升臺灣學者與全球學術研究公平競爭，對於取得國外資源更是幫助甚大。而確實，這個世代準備萬全及充滿抱負的研究學者，他們的學術成就在過去十年間大量提升了外文學系在全球的地位，亦減輕了顧問指導及在本地執行同儕評鑑的問題。學生不管在語言上或自信心上都有了提升，減少進階課程前再做語言訓練基礎課程之必要性。在這樣的環境進步下，中央大學的

大學部課程更趨近國外大學之課程內容：包含許多英美文學、世界文學、文化及電影研究，更有英語教學及翻譯課程提供學生作為未來職業之資源及涵養。現今的人文學科教授比起以往更能在教學及學術研究的領域上發揮其專業。這不僅僅有助於學者的自我實現，更使大學系所逐步發展成更有專業競爭力並擁有與世界接軌的能力，帶領臺灣學術研究走向一個更充滿自信及眼光遠放的未來。

在這些種種的進步中我受益良多，即使過程中不免因變遷速度的緩慢而感到挫折，我仍深深感謝那些為臺灣學術研究，尤其是人文社會學科，推動現代化貢獻良多的人士。同時，我也鼓勵年輕學者擁抱這些社會的變遷及隨之帶來的機會。儘管人文學科的研究與自然科學大相逕庭——相較於團隊合作，人文研究學者通常是獨立作業——我們往往面對龐大且包羅萬象的資料；在透過閱讀、寫作及批判思考的分析過程中，我們亦不能從科技的進步或委託給其他助理來使研究更為簡易輕鬆，進步的步調相對緩慢。一路走來的研究之途，使我挫折的往往來自於自身緩慢的步調，而非來自我身處的這個體系。因此，不管是否在穩定成長的學術環境體制中，「堅持不懈」是為踏上學術之路的人文學者最重要之要素。

當然，如今教研體制仍未臻完美，例如：繁忙的教學職責，儘管在臺灣最頂尖的大學也常是國外相等教育學制三倍的繁重。因此，若期望臺灣教授符合學科教學的常規，或企盼人文學科研究及教學能提升至與全球的水準一致，則需要持續的制度革新。身負促進改革權責之相關人員須從自身的系所及學校開始做起，因為年輕教授在投身研究過程時首先遭受阻力之處，即其身處之系所，因基礎課程如語言教學之義務往往侷限該系所原應具備之宏觀。然而，相關改革同樣需要集結如國科會等各學術機構的共同執行，重新由下而上帶動討論人文學科在臺灣大學教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提供對應方針促進其發展。